

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在沪研讨

## 和笔下人物一起用生命书写、用行动投送的“一封信”

本报记者 张滢莹

“我觉得我今天依然是先锋派，没有变过。”3月29日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行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上，作家孙甘露说。

作为他睽违多年推出的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自去年出版以来已加印12次，入选多个重要年度榜单，并获“五个一工程”奖。来自读者和评论界持续至今的反馈、热议，也使得这一作品成为跨年度的现象级出版物。作家是否由此完成某种转型？小说在哪些方面形成了突破？在紧凑的情节之中，蕴含着怎样的美学特质？研讨会上来自评论家们的恳切话语，也映照出这部作品在文本意义之上不断生发着的、丰富广博的阐释空间。

## 在“行动”中产生的美学

“《千里江山图》是孙甘露写给历史、写给上海的一封信，也是他写给未来，写给三四月间桃花盛开的春天的一封信，是他和笔下人物一起用生命书写、一起用行动投送，而今天的人用强烈的精神共鸣来接收的一封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阚宁辉表示。“整部作品从第二页开始出现许多信，密信、口信、远方来信和最后一封没有署名的



信。小说的情节绝大多数与信有关，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担当着信使的角色。《千里江山图》是关于信和信使的行动之书、信念之书、生命之书，这些无处不在的信和信使几乎就是解读《千里江山图》这部书和‘千里江山图’计划最重要的密钥。”

问世初期，许多人把《千里江山图》当作谍战题材的小说。在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看来，定位于革命历史时期的这部作品有着显著的特点。“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百分之七八十的作品以战争题材为主，另外一条地下战线，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展现得很少。”在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战略

转移的大背景下，小说书写沉重、黑暗的环境中，党员同志以大量的流血牺牲冲出厄运，转向新天地，“这一段历史几乎没有特别好的长篇小说去表达，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千里江山图》填补了空白。”他同时指出，从现实主义理论来说，小说除了细节真实之外，在大量铺垫上有更高层面的历史真实，在真实和虚构的结合中，从历史角度接近了当时非常严峻的形势。

“如果说孙甘露之前的作品以抒情为主，这部则是行动高于抒情，行动的诗学成为他写作的重要转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文贵良

表示。在复旦大学教授邵元宝眼中，孙甘露写作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则是从先锋派在天空中飞翔的姿态，转到了地面。在他看来，其中最重要、最大的考验依旧是人物塑造。“在正反两个阵营的人物塑造中，他都非常注意开掘人物心理和精神上的中间地带、灰色地带，把当时各种人物，和其中的流动性、变动性表现出来了，足以使人物跟当时多变的历史相契合，保证了小说转型的成功。”这与《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在编辑稿件过程中的感受形成了印证：当她为作品做了一张人物图谱后，发现其中呈现出很有意思的散点辐射的状况，“所有人看似不相干，但凌乱无序的背后，都有着自已内在的方向。广袤宇宙中似乎有一块看不见的磁铁，每个人的磁性，都决定了历史和未来。”

对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而言，《千里江山图》形成的是孙甘露一次关于时空的再出发，一次先锋的自我革命，也是革命和爱情的版本升级，其中重新塑造了小说和历史的关系。“以前我们一直谈及孙甘露的语言突破，现在他从内里的突破走向了外在的突破。如果说从前他作品的关键词是‘缓慢’，这次则给出了新的关键词‘行动’。”小说开篇的

秘密会议上，每个人携带一张骨牌从四面八方赴会，开始执行“千里江山图”的任务，这一场景令她印象深刻。“他们个个都是有名有姓的，以截然不同的速度行走江山、逆流而上，这些人不仅构成了孙甘露小说史上的新人，也是这个时代的新人。他们在行动中产生的美学，是一种新历史新时代的美学。”

语言风格的转变  
与“底色”的坚守

在对文学史的研读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吴俊提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文学都出现了文体、文类的“大爆发”，这种爆发的背后，是写作媒介和社会条件的充分发展。在许多关于《千里江山图》的评论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现代中文学刊》主编罗岗也注意到，大家往往从通俗的和先锋的、大众文化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对立关系展开讨论，但他认为，当我们真正回到先锋文学的历史，会发现通俗文化的变化可能会刺激现代主义的探索。进一步说，媒介的变化，导致读者和作者获得了新的调动感官的方法。

(下转第6版)

## 以个体命运构建民族心灵史诗

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学术研讨会南京举行

本报记者 何晶

在长篇小说《有生》中，胡学文将百年人生的庞大和细小浓缩在主人公奶奶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讲述中，写大地上的人，写一些命运和生命本相。这部民族寓言、生命史诗，是胡学文为乡土立根，为众生立命之作。3月27日，该书研讨会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联合《钟山》编辑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主办。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阎焱看来，《有生》是一部辨识度很高的长篇。“作为一部将近六十万字的长篇，胡学文从一开始就给自己树立了具有极高难度和挑战性的语言风格，那就是抒情。全书有很多对话、很多人物，但是没有用引号，所有的对话都是以一种叙事的口吻出现，在奶奶的章节里有她或者是别人的对话，则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出现的，这种过滤要做到既恰如其分，又相得益彰，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时，作品中有社会，也有历史，更有历史的沿革、变化、转型对具体的个人、家庭，或者说乡土的改变，这是《有生》能在当前中国作协所倡导的新乡土小说的叙事当中站得稳，并成为一种具有启示性、代表性、典型性作品的重要原因。”

乡土与现代，是《有生》中重要的关键词。如南京大学教授丁帆所言，《有生》所描写的整个乡土社会的秩序进入了百年循环，从中能看清楚乡土文学的走向，因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元素都在里面，在人物和事件当中都有精彩的表现。

乡土与现代显然并置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内部，《有生》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了一次深入阐发，无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将其称为“一种东方式的中国式的全息长篇小说叙事”。“《有生》的时间是静止的，但是里面充满了风暴，人性的风暴、历史的风暴，全部在静态里面。”他认为，这种写法是胡学文的一种探索，但没有给人怪诞的感觉，而是清晰地呈现了百年人生的来路与去处，这是历史，更是“诗”。“《有生》是人性自身把历史牢牢吞噬，这提升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精神品质。”

《有生》的书写，凝结了胡学文自身的经验，以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张学昕的观察，《有生》是一种一次性经验的书写，具有不可复制性。也正因为此，小说从人物命运进入到家族史，我们要将其放置到百年史诗的层面来考量它，“胡学文从个人史的维度来深描历史，尝试写出百年风云变幻的大历史、大时代。如何进入一个作家的内心，又怎样由作家对个人性经验的沉淀和过滤，在《有生》的文本里结构里有清晰的呈现，以个人小写的历史而形成整个民族的心灵史、灵魂史、情感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与他的看法不谋而合，“《有生》是对自然史和生命史的回归，将大历史缩减到最低，每个人物自成一体，退回到生命和原欲最本初的层面，人的生命意志超越了历史，使整个小说具有

了象征意味。用史诗品格来说，它区别于被大历史所设定叙事路径，突破了家族史叙事，开辟了创造性格局，构建了大写的个人的史诗。”

胡学文为《有生》设置了伞状结构，小说中的各个人物，仿佛被粘在这把伞的伞骨之上，轻轻触碰一个结点，几条叙事线索就同时行动起来，突然延伸或者收缩，而人生的各种收放也随之展现，尤其是生与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表示，《有生》呈现中国人的生活、生态和生存，而这其实是每一个汉语写作者都应该正视的现实主义之中国现实。当百年中国社会成为当代作家的母本，生之艰难和坚韧自然会成为小说的母题。如小说标题所示《有生》首先指涉的是生之规律、生之奥秘、生之色彩，这是一部生之书，写的是人的活法。

作家潘向黎认为，《有生》其实是平衡了生与死的两级。“《有生》对死亡正面强攻，让人看到人生的痛苦、命运的无情。正因为这一极如此坚硬残酷，会让人担心另一极怎么办，胡学文的做法是将另一极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写得热烈有韧性，完全跟死亡和绝望互相媲美。女主角奶奶的身份是接生婆，这里面有强大的繁衍的暗示和生的意志的概念。奶奶失去一个又一个丈夫、孩子，但是她生的意志很强大，这完全构成了与死亡和绝望对照的另一极。”

对于生与死的探索，显然具有形而上的意味。以南京大学教授王

彬彬的分析，《有生》不仅书写了人生的质地，而且超越了生命，走向了形而上。“整个作品有一种俯瞰人间各种非善恶的精神境界。以奶奶为代表的物象形象，文学史上找不到可以类比的。《有生》在整个精神内涵和对生命的态度上，提供了很新鲜的元素，人物也是中国文学人物画廊里面非常有独特性的。”

北京大学副教授丛治辰将人物的命运推至到乡村的命运上，“《有生》呈现了一种过渡状态。胡学文不仅写了旧的乡村也写了新的乡村，他的意义在于他用了更长时间段的眼光来写了今天的乡村，是新和旧结合在一起的叙述，是真正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有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因为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做一个总结性的东西，作为可能是最后一代有传统乡村经验的人，包括胡学文在内的这一批作家应该来做这个总结，《有生》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刘大先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他将《有生》看作是乡土根性的铭刻书写。“《有生》虽然主要是以张家口为原型，但是它褪去了地方性色彩，并不以突出某种地方特色为目的，而是对有共通性质的乡土文化的书写。不同于一般的乡土挽歌，《有生》中的奶奶所象征的乡土根性的离别是必然的，不是无可奈何的缅怀，而是认识到死之必然和生之常在的通达，正是因为有死的终结，才有生的新变，而文化的绵延不绝和格物鼎新就在这种根性当中。”